

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编辑部

CHINESE CLASSICS & CULTURE ESSAYS COLLECTION

中國典籍與文化



中華書局

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

第 五 辑

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编辑部编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第5辑/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编辑部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00

ISBN 7-101-01939-0

I. 中… II. 中… III. 古籍整理-中国-文集 IV. 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057 号

执行编委:杨 忠 刘玉才
责任编辑:黄 松 张 荷

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

第五辑

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编辑部编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3¹/₂印张·1 插页·310 千字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 定价:31.00 元

ISBN 7-101-01939-0/I·311

目 录

《尚书》的版本源流与校勘·····	顾颉刚遗著(1)
《大戴礼记》佚篇考辨·····	刘晓东(47)
释“熱”——读帛书《老子》小札·····	宋启发(56)
汉初“黄老道德之术”剖析·····	汪春泓(59)
关于现存几种五臣注《文选》·····	傅 刚(82)
李白屡遭挫折与倍受赞誉之两面观·····	周勋初(93)
论讲经文与变文的关系·····	伏俊连(110)
从新变代雄论宋诗之价值与地位·····	张高评(124)
晏殊诗与西昆体·····	邝健行(162)
苏轼兄弟异同论·····	曾枣庄(173)
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	
——由读宋杨万里《诚斋集》稿想到的·····	陈 新(198)
略论辽金元少数民族汉诗·····	张伯伟(212)
《全唐诗》所收明人伪造唐集简论·····	刘再华 陶 敏(231)
作为剧作家的李笠翁·····	冈晴夫著 刘 萍译(244)
王绩首次出仕与退隐事补说·····	贾二强(271)
从文献记载看 6 世纪中期到 7 世纪初年的洛阳·····	黄永年(274)
宋代官语汇释·····	龚延明(286)

《酉阳杂俎》中的一段虾夷史料·····	曹 汛(319)
两《唐书》天文史料脱误补正·····	刘青平(328)
日本史籍中唐乐舞考辨·····	王克芬 苏祖谦(335)
《西溪丛语》《家世旧闻》点校琐议·····	薛正兴(405)
《夷坚乙志》校补三则·····	张祝平(420)

《尚书》的版本源流与校勘

顾颉刚遗著

一、古代简册制及其不易保存的原因

甲骨文以前的文字，我们到今还不曾发现。猜想商代记事的工具，一定是竹、木简和木板（《仪礼·聘礼》：“百名以上书于策，不及百名书于方”，“名”就是“字”，“策”就是“简”，“方”就是“版”。凡是不足一百字的文书，就写在一块小木板上），所以周公在《多士》篇里说：“惟尔知：惟殷先人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。”“册”甲文作“𠔁”（《殷虚书契前编》四、三七），表示用丝线或麻绳把一堆竹、木简联结起来；或作“𠔁”（《前编》七、十二），表示史官用双手捧着册书。“典”，金文作“典”（《召伯虎殷》二），表示把一堆联结起来的竹、木简安放在架子上（胡厚宣同志面告：“龟甲有带孔的，似为穿结之用。其孔较大，可能用皮革穿结，所谓‘韦编’者。”是则竹、木简的编成典、册，即由储存龟甲、兽骨的制度递嬗而来）。这可见成汤伐桀的事情已由商代史官用文字记录在典册上，所以周公可以利用它来作为武王伐纣的比例事件，塞住“殷遗多士”的不满意的嘴。可惜这些竹、木的书写工具在潮湿的空气里最容易朽烂，也最容易给蛀虫所啮坏，如果隔了一个时候不重写上新简，就会在无形中销毁残蚀。关于这一现象，我们只须看《春秋经》，在《隐公篇》里有“纪子

伯”(二年),在《桓公篇》里有“夏五”(十四年),在《庄公篇》里有“郭公”(二十四年),这些明显的阙文都出在春秋前期,《桓公篇》里又常常半年不记一事;而春秋中期赫赫一世的霸主齐桓公,在《左传》中竟没有详细的叙述,如果没有《春秋经》的一些简单的记事,他的政治事业真要成个空白点,就可以推想它删定时已隔了二百多年的文献是多么地零断。从前的学者每每喜欢讨论《春秋》一记为什么不起于鲁的始封之君伯禽,也不起于周王朝东迁之初的鲁孝公或鲁惠公,而偏偏起于东迁后已四十九年的鲁隐公,从而替孔子想出种种道理来解释这个问题。由我们看,这全是多馀的猜想。我们只该问:到孔子时,在鲁国史官那里保存的记事典册,存留了多少?对于这个问题,大概可以回答:只存了两世纪半,以前的都已化为灰烬了。我们现在参观各地图书馆,在它们那里所收藏的报纸杂志,只要在四五十年前的,为了用的是芦苇或稻草作原料所制成的纸张,已是变黄发脆,经不起翻阅,以今证古,那些竹、木简的断烂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。《论语》中记孔子的话:“夏礼,吾能言之,杞不足征也。殷礼,吾能言之,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,则吾能征之矣。”(《八佾》)《礼记》、《礼运》和《中庸》也有类似的话。“征”,是征验和证明的意思。孔子是一个很有历史观念的人,他虽然听得了一些夏、殷的礼(制度),但认为这些只是后世的传说,总不够征信前代的事实,必须得到典册的证明才放心,所以他亲到夏后的杞和殷后的宋,想去寻求它们的第一手记录,然而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只有给他一个失望,为的是杞、宋的古籍已经湮废净尽了。在没有经过人为的秦始皇焚书之前,古代记录已经归于自然的销毁,这不该不归咎于记录工具的不坚固。我们现在所以能够见到许多商代的甲骨和商、周间的青铜器,因为这些东西的质地都很结实,不易为自然力量所摧残的缘故。可是孔子时还不懂得考古,他

就无法从地下觅取夏、商的资料了。

二、地下简册的发现

自从商代到汉代,经历了一千数百年,记录的工具一直没有改。这些在地面上的典册早已渐灭光了,只有埋藏在地下,因为封闭工作做得好,没有受到空气的侵袭,或者虽没有深埋,但因分布在雨量稀少的高原及沙漠里,受不到水气的腐蚀,一部分还保存着。最著名的一次,是晋武帝咸宁五年(279)(一般都说是太康元、二年,即公元280、281年。这里依据朱希祖《汲冢书考》的说法),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,得到大批竹简文书,整理出《竹书纪年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等珍贵的古籍,充实了我们的古史宝库,改正了《史记》等书的错误记事。近年发现的竹简,有出于长沙和信阳的楚墓的,也有出于居延黑城子的居延都尉府遗址的,可以探究出若干战国和西汉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。至于直接关系于古代经典的,则有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三本《仪礼》残简,墓主该是西汉后期的一位教授《仪礼》的经师,它保存了比较早的古书面貌,这一个新发现便大有助于经典本身的认识和整理。

三、战国时《尚书》本子及其毁灭

《尚书》的最早面貌,已不可知了。所谓孔子编定为百篇之说,只是一个后起的传说,没有事实可以证明(这一传说始见于《汉书》的《艺文志》及《儒林传》,见本编上乙叙论)。看战国时人所著的书,如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孟子》等等,它们征引《尚书》的文字,或但称为《书》,或举出篇名,或举出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、《周书》等时代的类名(还有《虞书》一名见于《左传》文十八年,所以《伪古文尚书》把《尧典》到《益稷》四篇定为《虞书》。可是《尧典》、《皋陶

《虞书》两篇开首都冠以“曰若稽古”，可见作者本没有自记为虞人。又《左传》僖二十七年引《皋陶谟》“赋纳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”三语，依然唤作《夏书》。《墨子·明鬼》云：“尚〔上〕书〔者〕的误文”《夏书》，其次《商》、《周》之书。”又可见墨家所诵的《尚书》以《夏书》为最古，没有什么叫做《虞书》的。从上面的几条证据看来，“《虞书》”应是一个后起的名词，被窜入《左传》的，正和《说文》中所提的《唐书》一样地不可信，故不列，可见当时必有一部编辑得比较完整的本子。只是这部完整的本子自从秦始皇三十四年（公元前 213）听从李斯的话，制定了“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弃市。以古非今者，族。……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）的严酷的法律之后，就在民间绝迹了。其藏在博士官那里的本子，也因项羽“西屠咸阳，……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”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而化为灰烬。固然也有人根据了萧何的“沛公（刘邦）至咸阳，……何独先入，收秦丞相、御史律令、图书藏之”（《史记·萧相国世家》）一事来证明《六经》未尝亡缺的（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·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》），但萧何所注重的原只有可以为刘邦政权服务的政事资料，而秦丞相、御史两府里所藏的也尽是些政治、经济方面的档案，所以下文便说“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、户口多少、强弱之处、民所疾苦者，以何具得秦图书也”。这位以县吏起家的萧何，他哪里会注意到文化方面的博士衙门，赶紧把《六经》保存好了呢？

四、伏生本《尚书》的分立三家

到汉文帝时（公元前 179——公元前 157），离始皇焚书已经五六十年了，这位最高统治者才想起了《尚书》这部书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说：“伏生者，济南人也，故为秦博士。孝文帝时，欲求能治

《尚书》者，天下无有。乃闻伏生能治，欲召之。是时伏生年九十余，老不能行，于是乃诏太常（主管宗庙礼仪的机关），使掌故（主管故事的官）朝错（“朝”，也作“鼃”、“晁”）往受之。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大起，流亡。汉定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（应作“二十八篇”，因为把汉武帝时新得到的《太誓》一篇增加进去，所以综称为“二十九篇”。不知道是司马迁的原文如此，还是后人所涂改），即以教于齐、鲁之间。”这就可以看出：以当时中国之大，文化根柢之深，然而保存的《尚书》只有伏生一本，而且这仅仅是兵火流亡中的一个残本，真可以说到了“不绝如缕”的危险境界了。这个本子是用汉代的通用文字——隶书写定的，经过汉皇朝的着力提倡，先后立欧阳高、夏侯胜（大夏侯）、夏侯建（小夏侯）三家于博士；到西汉末年古文家兴起之后，被称为《今文尚书》。因为这三家的经文有不同，所以他们各有其“章句”，解说也有不同，所以他们又各有其“解故”或“说义”（均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。这实在是一种人为的纷扰。伏生传下来的《尚书》本只有一本，汉武帝把它立于博士，欧阳一家所奉的就是这一本，为什么会分出大夏侯和小夏侯两家来呢？这跟当时皇帝们用了物质刺激来提倡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说：“昭帝时举贤良文学，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。宣帝末，增倍之。元帝好儒，能通一经者皆复（免除他的徭役和赋税），……更为设员千人；郡国置《五经》百石卒史。成帝末，或言‘孔子布衣，养徒三千人。今天子太学弟子少’，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。”从武帝时博士弟子不到一百人增加到成帝时的三千人，而且一百多个郡、国都设置经师，学子多了，老师也就需要适应地增加了。至于博士的俸禄，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说是“秩比六百石”，而且升起官来可以做到尚书、刺史和诸侯太傅，实在给一班读书人开了一个广阔的向上爬的门路。因此，他们想尽方法来自立门户，

而自立门户的方法则是和原来的经本与经说故意制造矛盾,使得国家不得不添置若干新学派的博士,于是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经文和不同的解释。

五、从武威新出仪礼汉简看家派下的不同本子

《今文尚书》三家的经文和解释怎样地不同,因为资料散失殆尽,我们已无法清楚地列举出来。但在武威磨咀子的汉墓里发现的比较完整的九篇《礼经》(即《仪礼》。《仪礼》是一个后起的名词,非汉代所有),却可给我们一个相当有力的旁证。依据《汉书·儒林传》,礼有大戴(德)、小戴(圣)、庆氏(普)三家之学立于博士。这位墓主虽不曾留下他的姓名,但在他的记事中有“河平”年号(成帝时,公元前28—公元前25),墓中又有王莽(9—22)钱“大泉五十”十二枚,可以知道他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中期,死于公元1世纪的初期。他的墓中有三种《礼经》的本子,可以推想他是一位在武威教授《礼经》的老师。或即“郡国《五经》百石卒史”之一。现在大、小戴和庆氏三家的本子虽是都已失传,但郑玄在他的《三礼目录》(贾公彦《仪礼疏》引)里却记下了大戴、小戴和刘向《别录》的三种不同的篇次,那就可以把这汉简本和它对勘。想不到对勘的结果和这三本都不相同,例如大戴本《少牢》第八、小戴本《士虞》第八、刘向本《聘礼》第八,而这汉简本则是《服传》第八;又如大戴本《聘礼》第十四、小戴本《既夕》第十四、刘向本《士虞》第十四,而这汉简本则是《泰射》第十四。因此,经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人的研究,这个本子既不同于大、小戴本,就极大可能是庆氏本,这位墓主应当是传庆氏学的一个人。这戴、庆三家博士都出自后仓,正同欧阳、夏侯三家博士都出自伏生一样,为什么但就篇次一事而论已有这般地差异了呢?这没有别的原因,只为有了距离才可以分立博士,才能以

攫取国家俸禄来号召后学,扩张自己的势力。在全国解放前反动政府统治下,不是“党中有派,派中有系”,各个以小集团的力量为个人争权夺利吗?汉代学术界中所谓“各守颞门”,所谓“门户水火”,说穿了可不就和这些反动派系的目的一样?我们敢说:他们的互不相同决不是真正得到古本的依据,而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,纷纷涂窜古书以自成其“一家之言”,这只是一种人为的扰乱。

六、经典文字动荡不定的状态

今本《仪礼》是郑玄《注》本。他生于东汉后期,那时今文和今文、古文和今文的起哄打架已历三百多年,经学家和读书人的情绪都有些厌倦了,于是有一班博学的人起来,想打破今、古文的樊篱,去非从是,合各本之长,定为一本。在这班人里边,郑玄是一个实干家,他不惜破费功夫,杂糅今、古,编注群经。就他的《仪礼注》看,例如《士冠礼》:“布席于门中,阒西、阒外。”《注》云:“‘阒’,门概;‘阒’,阒也。古文‘阒’为‘𡩶’,‘阒’为‘𡩶’。”贾公彦《疏》云:“郑注《礼》之时,以‘今’、‘古’二字并之。若从今文不从古文,即今文在《经》,‘阒’、‘阒’之等是也;于《注》内叠出古文,‘𡩶’、‘𡩶’之属是也。若从古文不从今文,则古文在《经》,《注》内叠出今文,即下文‘孝友时格’,郑《注》云:‘今文“格”为“𡩶”’。又《丧服注》:‘今文无“冠布纓”’之等是也。”按“阒”和“阒”都是《仪礼》著作时代的房屋构造的制度,后起的古文家为了和今文家立异,不惜改为“𡩶”和“𡩶”,那么“𡩶西𡩶外”之句便非逼得人们陷于没法解释的地步不可。郑玄择善而从,目的在使人易读易解,这正是他的优点。那些抱残守缺的经师们长期骂他“破坏家法”,不知道我们读这些经典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古代事实呢?还是要一意卫护经师们设下的家法呢?现在新发现的这本汉简《礼经》,时代较先,还不能有郑玄一

般的认识,所以这本文字便大异于郑本。例如《燕礼》中,郑本作“遂歌乡乐,《周南》: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卷耳”;《召南》:《鹊巢》、《采芣》、《采蘋》”,这是和《毛诗》一致的,我们读惯《毛诗》的人一眼看去就非常顺利;可是这部汉简本则是“遂歌芣乐周南关雎葛胜綰耳召南鹊蕉采芣采難”,在20字中异文即有6处之多,别的还可以说是“声近通假”,而“難”即“藻”字,显然见出《毛诗》的“于以采蘋?南涧之滨。于以采藻?于彼行潦”;在别一本里却是前两句倒转过来的,所以篇题应为《采藻》,那写作《采蘋》的或是《毛诗》一家之言了。所以这一古本的发现,可以昭示我们:汉代是所谓经学极盛的时代,然而经书本身的篇次和文字是怎样地动荡不定。其所以动荡不定的原因,有的是因为书写的人态度不严肃,写后也没有好好校对,有的则是为了经学上既有分门别户的需要,就故意要弄出这些玄虚的花样。

七、战国时引用《尚书》文字的歧异举例

《仪礼》作于《战国》,除掉名物、礼节过于烦琐不易认识和记忆之外,它的本身可以说文从字顺的。《尚书》则大体上出于商、周时代史官的手笔,它的语法和字体已和战国之世很不一样,所以战国时人引用它时已不胜其歧异。关于这一点,我们试在《墨子》里提出一项证据。《墨子》这书,从《尚贤》到《非命》十篇,每篇各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篇,可是三篇的意义是差不多的,那么,为什么每一篇一定要分作复查的三篇来呢?这个哑谜,清末的俞樾曾根据了《韩非子·显学》的话试作一个解答。他说:“墨子死而墨分为三:有相里氏之墨,有相夫氏之墨,有邓陵氏之墨(《显学》语)。今观《尚贤》、《尚同》、《兼爱》、《非攻》、《节用》、《节葬》、《天志》、《明鬼》、《非乐》、《非命》皆分上、中、下三篇,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,意者此乃相里、相夫、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,后人合以成书,故一篇而有三乎?墨

子弟子网罗放失，参考异同，具有条理；较之儒分为八，至今遂无可考者，转似过之”（见他为孙诒让作的《墨子閒诂序》）。墨子口里所讲的话，他的三个弟子笔记了下来，三个弟子分成三家，又传弟子，因此三家记录的各有繁简和字句的出入，后人把三家所记的合为一书，又硬分出上、中、下来，成为今本《墨子》，这是一个很近情理的推测。然而《尚书》是客观存在的一部书，《墨子》很看重它，说话时常常提到，墨家虽分为三，理应有一致的《尚书》读本，可是在事实上怎么样呢？我们试就他们所引的《大誓》一篇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：

（1）《天志中》：“《大明》之道之曰：‘纣越厥夷居，不肯事上帝，弃厥先神祗不祀，乃曰：‘吾有命，无廖僇务天下。’天亦纵弃纣而不葆。’察天以纵弃纣而不葆者，反天之意也。”

（2）《非命上》：“于《大誓》曰：‘纣夷处，不肯事上帝鬼神，祸厥先神祗不祀，乃曰：‘吾民有命，无廖排漏。’天亦纵之，弃而弗葆。’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。”

（3）《非命中》：“先王之书《大誓》之言然曰：‘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，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，曰：‘我民有命，毋僇其务。’天亦弃纵而不葆。’此言纣之执有命也，武王以《大誓》非之。”

（4）《非命下》：“《大誓》之言也，于《去发》（庄述祖说，《去发》当为《大子发》，为《大誓》的上篇）曰：‘恶乎君子？天有显德，其行甚章。为鉴不远，在彼殷王：谓人有命，谓敬不行，谓祭无益，谓暴无伤。上帝不常，九有以亡。上帝不顺，祝降其丧。惟我有周，受之大帝（应作“商”）。’昔纣执有命而行，武王为《大誓·去发》以非之。”

这四段都是引的《大誓》，却都不一样。其一，《天志中》说所引的是

《大明》，这似乎因为《诗·大雅》中的《大明》也是记的武王伐纣的事，由于联想所致的误写。其二，《天志中》的“无廖俛务天下”，孙诒让《閒诂》说“天下”二字是衍文，那么上面的四个字，《非命上》作“无廖排漏”，《非命中》又作“毋廖其务”，究竟哪一个对呢？其三，依俞樾说，《墨子》从《尚贤》以下三十篇是墨分三家之后所记，然则《天志中》和《非命中》同为中篇，分该同出于其中的某一家，为什么这家先后引的《大誓》，而所引的文字，两篇又有些不同呢？其四，《非命下》所引的《大誓》，不但多出了《去发》一个篇名，而且全文是韵语，跟前三例为散文的都不同，这是什么缘故？若说韵语的《大誓》是某一墨家所杜撰，那又不然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引《大誓》云：“我武惟扬，侵于之疆。则取于残，杀伐用张。于汤有光”，也一般是韵语，而且和墨家所引的又同为阳韵，可以断说本是一篇文字而为儒、墨两家所分引的。那么，是不是那时儒、墨同诵的《大誓》已有两种不同的本子，一本是散文体，一本是韵文体呢？其五，《天志中》所引的纣语为“吾有命”，是说殷王自己有天的定命，可是《非命上》、《非命中》都说“吾（我）民有命”，那是说殷的人民有定命，而《非命下》的“谓人有命”则是说一切的人都有定命，这究竟应该把哪一本作为正确的本子呢？这仅仅是一篇《大誓》，可是《墨子》中四处所援引的已有这些明显的差别，不仅字句有异，而且文体也有异，可见战国时的《尚书》本子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。

八、汉代今古文《尚书》文字的歧异举例

到了汉代，篇数减少了。可是为了经师们的分门别户，今文三家和古文若干家又各有其不同的本子，文字问题成为难以解决的症结。例如《皋陶谟》，今本“在治忽”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作“来始滑”，《索隐》云：“《古文尚书》作‘在治忽’，《今文尚书》作‘采政忽’，先儒

各随字解之。今此云‘来始滑’，盖‘来’、‘采’字相近，‘滑’、‘忽’声相乱，‘始’又与‘治’相似，因误。”《汉书·律历志》引此，又作“七始咏”，段玉裁说“咏”是“训”的误文，其作“七”者，乃是“泰”的假字。这三个字的纷歧如此，究竟我们应以哪一本为是呢？又哪样才可作出正确的解释呢？《盘庚下》，《今文尚书》本作“今予其敷优贤扬历……”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管宁传》注引）文不易解，《伪古文》本作“今予其敷心腹肾肠，历告尔百姓于朕志”，是说“我要掏出心肝和肚肠来，把我的意见尽情地告诉你们百姓”，讲固然讲通了，但“心腹”二字是从“忧”字化出来的，“肾”从“贤”字变形的，“肠”又脱胎于“扬”，“历”字改从下读，分明是后出的本子为了求得解释的便利而加上的涂抹窜改。这该怎样决定去取呢？又如《梓材》，今文本是“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”，王充《论衡·效力篇》解释它道：“此言贤人亦壮强于礼义，故能开贤，其率化民”，虽然勉强作出了解释，可是这“王”字并无着落，算不得一个好解释。古文本则作“……戕败人宥。王启监，厥乱为民”。两两相校，“戕”和“强”音同，“宥”和“有”音同，“启”和“开”音同，“监”和“贤”形似，“乱”和“率”（古读如“律”）双声，“为”和“化”音同，只有“败”字是古文有而今文无。《伪孔传》解为“察民以过误残败人者当宽宥之。王者开置监官，其治为民，不可不勉”，也较王充所说的为有条理。这究竟应该把哪一种本子作为正本呢？又如《君奭》，“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”一语，《礼记·缙衣》引作“在昔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”，郑玄《注》：“古文‘周田观文王之德’为‘割申劝宁王之德’，今博士读为‘厥乱劝宁王之德’，三者皆异，古文近似之。‘割’之言‘盖’也，言文王有诚信之德，天盖申劝之。”照这所说，此文共有三种读法：《缙衣》（《释文》引刘瓛云：“公孙尼子所作”，则出战国时）为“周田观文王”，今文为“厥乱劝宁王”，古文为“割申劝宁王”，“宁王”，“宁王”是“文王”的讹

文,说见本篇引吴大澂《文字说》。“周由观”和“割(‘割’的本字为‘害’,与‘周’的篆文相近)申劝”是形近而讹,容易看出;但今文本的“厥乱”则跟“周田”、“割中”在音、形上俱无相似之处,是不是博士们因为读不通而奋笔涂改的呢?这种问题极难解决,但如果不能作出一个适当的解决,那就无从为它作注释,更不容易替它作今译了。因此,校勘古籍的工作,无论做得好或做不好,我们总得做,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尽量搜集所有的资料,像乱丝一般地抽引出一个头绪来,在整理古籍的程序上,迈出第一步。

九、为了纠正经文差距而出现的汉石经及其残存文字

西汉时,成帝增博士弟子员为3千人,比武帝时增加了三十多倍。到东汉时,游学增盛,太学生至3万人(原因是可以借读书的名义逃避劳役),比成帝时又扩大了十倍。人多了,经书的本子上发生的问题也就愈来愈大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说:“章句渐疏,多以浮华相尚,儒者之风遂衰,……有私行金货,定兰台(皇宫里的图书馆)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”,可见这些地主阶级的子弟们仗着有钱,为了求得自己的胜利,不惜花出若干贿赂来买通宫中工作人员,把国家所藏的经本照着他私家本修改。那时议郎蔡邕就提出了“经籍去圣久远,文字多谬,俗儒穿凿,疑误后学”的问题。又有一个比较有学问的宦官李巡(他著有《尔雅注》,清臧庸、黄奭等有辑本)也看不过了,向灵帝建议,请诏诸儒正定《五经》文字,凿石立碑。灵帝答应了他们的请求,就命蔡邕、堂溪典、马日碑等共同担任了这项任务,蔡邕(决不止他一个人,但他人未见记载)又用朱笔把勘定的本子写在石碑上,经过工人的镌刻,树立于太学门外。石经立后,很多读书人为了求得一种标准本,“观视及摹写者,车乘日千余辆,填塞巷陌”(以上见《后汉书》的《蔡邕传》及《宦者吕强传》)。这是经书本子